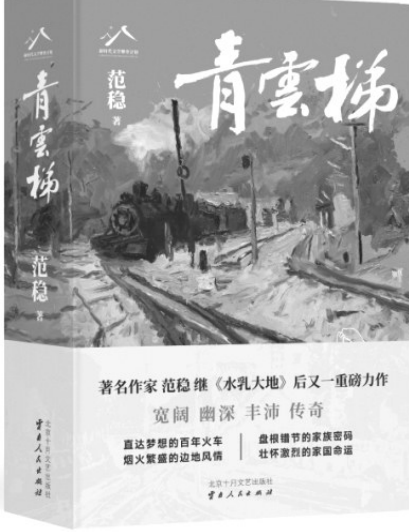


缠枝与铁轨：路的变迁与百年家族史

辛澄清

看点 范稳的《青云梯》以其宏大的历史视野和细腻的笔触，为我们铺设了一条由冰冷铁轨与温热血脉共同构筑的时光通道。在这部作品中，“路”的变迁与“家族”的兴衰不再是两条平行的线索，而是如藤蔓缠绕般紧密交织，共同谱写了一曲跨越百年的家国史诗，是一部探索民族精神的阶梯、追问现代性源流的文学力作。



在彩云之南的红土高原上，时间似乎有着特殊的刻度。范稳长达45万字的长篇小说《青云梯》以云南百年铁路史为经

纬，横跨七代家族命运的作品，不仅延续了范稳自《水乳大地》以来的宏大叙事风格，更以其“史诗般的正大品格”被誉为当代历史小说的新标杆。这部作品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历史小说”范畴，它既是一幅跨越百年时空的铁路建设画卷，更是一部探索民族精神的阶梯、追问现代性源流的文学力作。

《青云梯》的核心叙事围绕着两条紧密交织的线索展开：一是从法国殖民者修建的滇越铁路，到中国人自主修建的个碧石民营铁路，再到21世纪穿越国境的高铁，这一长达百年的云南交通发展史；二是以建水朱家花园为原型的吴氏家族和与之纠缠不休的陈氏家族，七代人在这段历史洪流中的兴衰浮沉。范稳巧妙地将个体生命嵌入民族复兴的宏大图景，使得铁路的每一次延伸、每一次提速，都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拓展，更是民族精神从被动挨打到自立自强，再到主动引领的“精神隐喻”。

书名“青云梯”本身即蕴含多层次的象征意义。在具象层面，它指代在云南崇山峻岭间盘旋而上的铁路，宛如一座通往云端的梯子。而在精神层面，它象征着一一种“冲克之志”——从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冲击，到“知耻后勇”“师夷长技以制夷”，再到胸怀天下、连通世界的志向攀升。正如范稳在访谈中所言，铁路对于一百年前的云南，犹如今天的互联网，是通往现代性的关键。因此，《青云梯》所书写的，正是一个民族如何架设并攀登这架通往现代文明、通往世界舞台的“云梯”的壮阔历程。

小说中另一个核心意象“缠枝莲”青花瓷碗，则与“青云梯”形成巧妙对比。缠枝莲象征着家族血脉的绵延与情仇，剪不

断理还乱。当分成两半的瓷碗最终合璧，家族的秘密得以揭开，血脉得以重续，这隐喻着在历史的断裂与创伤中，文化的根脉始终未曾断绝。青云梯（铁路）与缠枝莲（家族）一纵一横，一者指向空间的外拓与时代的奋进，一者指向时间的纵深与文化的内守，共同编织出一幅家国同构、古今对话的丰富图景。

范稳在《青云梯》中展现了驾驭宏大题材的深厚功力，其艺术风格鲜明的特征在于“虚实相生”叙事手法的精湛运用。小说以大量真实历史事件为骨架，如晚清云南七府矿权之争、滇越铁路通车、个碧石铁路的分段建设、中老铁路修建等。在此坚实的历史地基上，作家精心编织了吴廉膺、陈云鹤、山猫等众多虚构人物的血肉与命运。这些人物并非凭空捏造，吴廉膺的原型是建水朱家花园的朱朝瑛，陈云鹤的原型是石屏的郑营人陈鹤亭。这种基于史实原型的文学再造，使得虚构人物身上“不时闪现出真实历史细节的光芒”，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历史真实感和艺术感染力。

在结构上，《青云梯》采用了复调式的叙事框架，交织着四条线索：百年铁路修建史、吴陈两大家族兴衰史、云南地方文化和风物史、边地红色革命史。如此复杂的内容，在范稳笔下却“水乳交融，毫无拼凑痕迹”。小说开篇别出心裁，以一场在吴家花园横梁中发现家族秘档的“考古式”揭秘切入，瞬间营造出历史的纵深与悬念感。在叙事时间上，作品运用了蒙太奇手法，将历史画面与当代情景巧妙交替，让百年故事跨越时空，立体呈现于读者眼前。

对滇南地域文化的深度挖掘与呈现，为小说增添了浓郁而独特的美学气质。建水朱家花园（书中吴家花园）被誉为“滇南大观园”，其建筑细节、祭孔仪式的庄严肃穆、哈尼族民俗的灵动奇趣，以及摇摇晃晃

的寸轨小火车，共同构成了一个既真实又充满文学魅力的滇南世界。范稳此举有意突破了外界对云南“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充满异域情调”的刻板印象，他强调云南还有“跟中原文化连得非常紧密的一种文化传统”。这种对地方文化复杂性的深刻理解与表现，使得《青云梯》的“边地叙事”具有了超越猎奇、抵达本质的厚重感。

《青云梯》的价值体现在其深邃的历史认知上。它不仅仅是在讲述铁路史，更是在通过铁路这一“剖开近现代历史新的切面的‘利器’”，探测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交汇处的时代风云。小说揭示了铁路作为现代性象征的双刃剑效应：法国人修建的滇越铁路在带来屈辱的同时，也带来了蒸汽文明，惊醒了平静的边地。而中国人自主修建铁路的历程，则是一部民族觉醒、自力更生的精神史。这种书写，让尘封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让读者深刻理解“中国人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在碎片化、流量化的阅读时代，严肃、厚重、关怀历史的文学作品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青云梯》标志着范稳个人创作的一座新高峰，是范稳自《水乳大地》以来最有分量的作品。这部作品为当下如何书写百年中国、如何处理宏大叙事提供了重要的范本。书中对碧石轨铁路遗迹的深情描写，引发了读者对工业遗产保护的强烈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说，《青云梯》已不仅仅是一部小说，它更成为一把激活地方历史记忆、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钥匙”。《青云梯》实现了叙事新维度的开拓，它实现了从“古今对话”到“古今面对”的跃升。让历史与现代“面对面”，如同硬币的正反面，虽不能相见却一体共存。这种结构使得小说的历史感不再局限于过去，而是直接走进现实，追问我们从何而来、向何处去。

孟浩然徘徊于仕隐之间

顾 农

一般的选本和读者往往高度关注孟浩然那些描写闲居生活的诗，如《春晓》《过故人庄》《夜归鹿门歌》之类，这当然是对头的，此公实在喜欢在优美朴实的山水田园之中过他悠闲自在的日子；而对于他谈起自己思想的诗篇，则注意不够，其实他的这个方面也非常重要，而且具有某种典型意义。

试举一例以明之，孟浩然《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雨》诗云：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予复何为者，栖栖徒问津。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亲。归来当炎夏，耕稼不及春。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涧滨。因声谢同列，吾慕颖阳真。

这是孟浩然寻求仕宦前途不得要领，回复故园之后的作品，其中很有点自我安慰的意思，而能坦率言之。他说自己本来是仰慕陶渊明喜欢过隐居生活的，中间忽然心血来潮跑了一趟首都，现在冒着炎暑又回来了，从此以后安心隐居，不再瞎动脑筋，忙什么出山“问津”了。

孟浩然这一次到首都去，稍后复回不知在何年。《旧唐书·文苑传》载，浩然“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这是开元十六年（728年）的事情；又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中所说的他曾与采访使韩朝宗一道入京，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他四十五岁时。前引孟诗中所说的“栖栖徒问津”应当不在这两次之内，那还要更早些。按《新唐书·文艺传》曾记载他四十岁到长安时的一件轶事道：（王）维私要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

《唐摭言》卷十一、《唐才子传》卷二亦曾先后记载此事。《唐诗纪事》卷二十三说，孟浩然见玄宗并自诵其诗是出于张说的推荐。孟浩然对玄宗所朗诵的诗全文如下：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

夜窗虚。题为《岁暮归南山》。此诗当作于孟浩然上一次进京又回复故乡之时，现在是对着皇帝朗诵旧作，如果孟浩然到40岁时才第一次去长安，事情便很奇怪，明明是离开首都后的作品，怎么可能先行对玄宗朗诵呢？

孟浩然在40岁以前去过首都一事留下过若干痕迹。试看著名的《书怀贻京邑同好》：维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沾末躬。昼夜常自强，词赋亦颇工。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慈亲向羸老，喜惧在深衷。甘脆朝不足，簞瓢夕屡空。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当途诉知己，投刺匪求蒙。秦楚递离异，翻飞何日同！

这首诗当然是孟浩然三十多岁时在故乡作，寄给“京邑故人”，其中的“执鞭”用了《论语·述而》：“子曰：富贵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弹冠”的典故则出于《汉书·王吉传》：“吉与贡禹为友，时称王阳在位，贡禹弹冠”，可知孟浩然此诗之要旨即在打算进京求富贵，并希望他在首都的朋友

伸出援助之手，拉自己一把。

孟浩然第一次进京大约是应征而去的，他有一首《赴命（一作“京”）途中逢雪》诗：迢递秦京道，苍茫岁暮天。穷阴连朔晦，积雪满山川。落雁迷沙渚，饥乌集野田。客愁空伫立，不见有人烟。可知他是在一个严冬的雪后上路了的；后来的情形大约是给了一个不足挂齿的低级职务，浩然不肯接受。稍后他离京时作有《京还赠张维》诗：拂衣去何处，高枕南山南。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晚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旧潭。上面恩赐的“五斗米”即微薄的官俸不要也罢，拂袖而去，高雅之至；所以后来玄宗才指责他的诗句“不才明主弃”是“诬我”——不是我，不是你，是你不要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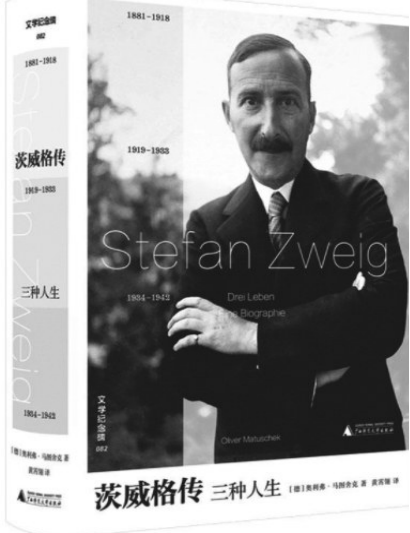
孟浩然在仕与隐之间徘徊彷徨，情绪起伏不定，其实也不是为奇。就是他仰慕不已的陶渊明，又何尝不是多次往返于仕隐两途之间，画出了一个又一个怪圈？情随事迁，各有种种不同的需要，此皆人生常态，虽高人如陶、孟亦不能全免。

重构心灵捕手的三重隐秘坐标

何 灿

■提示

奥利弗·马图舍克的《茨威格传：三种人生》深度剖析了20世纪文学巨匠斯蒂芬·茨威格的复杂灵魂。作者运用大量未公开的档案，穿透传主在其著名自传中精心构筑的“昨日世界”光环，揭示其公众声誉背后隐秘的情感纠葛、创作危机与流亡困境，将其置于理解20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命运的精神谱系中，为读者提供了一把打开文学史幽暗侧室的钥匙。



隐秘的情感、未竟的创作与苦涩的流亡生活，共同构成了20世纪文学巨匠斯蒂芬·茨威格这位“人类心灵捕手”的复杂

人生。

1942年2月，在巴西彼得罗波利斯的一间卧室里，斯蒂芬·茨威格与妻子服毒自尽。就在前一天，他将最后一部手稿寄往出版社，那便是后来被奉为经典的《昨日的世界》。这部绝命之作，是他对“昨日欧洲”最深情的回忆与悼念，却也成了后世理解茨威格的透镜。80年来，茨威格的身影在“昨日世界”的光芒中逐渐固化成一个悲伤的、与世界告别的欧洲文人形象。直到2025年，德国作家奥利弗·马图舍克的《茨威格传：三种人生》被译为中文，一种新的理解路径才豁然开启。这部近500页的传记，借助此前鲜为人知的独家档案，不仅再现了茨威格的创作、婚恋与抉择，更以其“学徒”“驰骋”“流徙”的幕人生结构，对茨威格那被反复复写、误读的形象，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祛魅”与“重构”。

茨威格曾在一次访谈中透露，他最初为自己的回忆录设想的书名是《我的三种人生》。马图舍克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被放弃的书名所蕴含的深刻自省，并将其作为整部传记的结构性支柱。在这本传记中，“三种人生”并非简单的时间切割，而是三种存在状态的递进与纠缠。正如传记所揭示的，茨威格的人生远比他自传中展现得更复杂和矛盾。第一种“学徒”人生，是维也纳中产阶级犹太青年在战前欧洲文明温室中的成长。他沉浸在安逸的文化氛围里，对世界的理解建立在书籍和艺术之上，其写作开始萌芽。第二种“驰骋”人生，是他作为“欧洲作家”的黄金时代。他成为被阅读和翻译最多的作家之一，居住在萨尔茨堡的奢华宅邸中，享受着世界性的声誉。然而，在公开的成功

背后，是他的情感世界正经历着复杂而痛苦的蜕变。第三种“流徙”人生，则是被迫害、流亡与最终绝望的旅程。从1933年离开萨尔茨堡开始，他辗转英国、美国，最终抵达巴西。这段人生最短，却最为沉重，最终以悲剧收场。

马图舍克利用大量未公开的信件与私人档案，揭开了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刻意回避的私人领域，补全了那“缺失的另一半”。茨威格的首任妻子弗里德里克曾给茨威格写过一句被后世反复引用的警告：“你的写作只是你本人的三分之一”。她预见到，如果不了解茨威格这个人，任何关于他的评论都将是“最空洞、最愚蠢的东西”。这句断语，几乎为后世所有的茨威格研究者立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而马图舍克的传记，其最核心的突破，便在于勇敢地突破了这一屏障。他没有将茨威格的作品与生平割裂开来，而是将其置于“三幕剧”的框架内，进行互文性解读。这使得传记的叙述极具张力。在“学徒”篇中，我们看到一个敏感早慧的青年，如何通过模仿和练习，在文学的阶梯上攀爬。他的早期作品，是内心不安与才华初绽的混合体。进入“驰骋”篇，传记则展现了一个复杂的悖论：公共声望的顶峰与私人生活的动荡是如何并存的。马图舍克回避茨威格在情感关系中的复杂与矛盾，尤其是他与两任妻子（弗里德里克与洛特）之间的纠葛。弗里德里克晚年出版的回忆录，虽提供了重要信息，却也因个人情感和记忆偏差而存在大量“或巧或拙的改动和隐瞒”。马图舍克的工作，正是通过对照原始信件，剥离这些后设的叙事，直抵事实的核心。

“流徙”篇则是全书情感最浓烈、分析最犀利的部分。传记不仅记录了茨威格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流亡，更深入地剖析了他为何在看似安全的巴西，选择了自我终结。马图舍克提出，茨威格如他笔下的极地探险家斯科特一般，是一个被时代漩涡吞噬的“成功的失败者”。

《茨威格传：三种人生》的首要价值，在于其坚实的史料根基。马图舍克不仅是作家，更是长期研究茨威格的专家和策展人，他曾策划“茨威格的三种人生”展览，并撰写多部相关著作。首先，这种学术背景，确保了他对档案材料的娴熟驾驭和严谨态度。通过对海量未公开信件梳理，传记极大地修正和丰富了读者对茨威格的认知。它驱散了笼罩在茨威格形象上的浪漫化迷雾，展现了一个更真实、也因此更复杂、更具人性深度的作家。其次，这部传记提供了一种理解20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命运的独特视角。茨威格的三种人生，恰好对应了欧洲从黄金时代、到危机爆发、再到彻底崩溃的三个历史阶段。他的个人悲剧，是个体在宏大历史暴力面前无力感的缩影。最后，它对当代传记写作本身具有示范意义。它证明了一部优秀的传记，绝非材料的堆砌，而是需要一种强大的、能够统摄材料的“形式感”和“解释力”。

奥利弗·马图舍克用手术刀般的精准，解剖了茨威格作为“人类心灵捕手”的灵魂结构。我们看到的，不再只是一个为旧世界唱挽歌的悲伤诗人，而是一个在荣耀与孤独、爱情与背叛、流亡与绝望中不断挣扎的复杂个体。“三种人生”的框架，正是这样一种成功的叙事策略，它使庞杂的生平细节变得脉络清晰，也让深刻的心理分析成为可能。



读到

在纸上重建故乡

李海卉

当我们翻开书页，如同一位怀揣模糊地图的旅人，试图在文字的经纬中，辨认出通往故土的道路。这个“故乡”，并非地理意义上的出生地。它更接近一种精神的原乡，一种文化血脉的源头。我们凭借作者提供的砖石，混合自身的记忆，在心灵的地平线上，垒起属于自己的城池与灯火。阅读，或许正是一场在纸上重建故乡的漫长跋涉。

哈罗德·布鲁姆的《生命的灿烂之书：布鲁姆文学之旅》，便是一部极为私人的返乡笔记，是他献给小说艺术的“最后一册批评之书”。书中，这位年近九旬的批评巨擘，回望了自己“一读再读”的50部小说。这不是冰冷的文学史，而是一场滚烫的“文学之旅”。他的“故乡”，是由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塞万提斯的骑士梦想、普鲁斯特的追忆所构筑的文学王国。他一生每一次重读，便是一次次地重返。每一次重返，故乡的风景都因他自身年岁的增长而有所不同。年少时为悲剧哭泣的角落，暮年时或许已成为领悟命运反讽的瞭望台。他的阅读，是一种确认：“看，我仍然属于这里，我的精神在此仍有居所。”他通过反复踏入同一条河流，来测量自我生命的深度与变迁，从而在变动不居的时间洪流中，锚定一个精神的故乡。

《且上书楼：藏书楼里的中华文脉》所展现的，则是一个文明共同体守护集体故乡的壮阔史诗。那散落在我国大地上的天一阁、玉海楼、嘉业堂，正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文化故乡”的实体化身。那些泛黄的典籍、精校的刻本、先贤的手泽，就是构成这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历代守护者“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誓言，学者于战火中舍命护书的奔徙，其意义远超保存物质文献本身。他们守护的，是整个民族可按图索驷、认祖归宗的精神地图。当后人走入这些书楼，指尖拂过书脊，便仿佛触摸到了文明绵延的脉博，完成了一次跨越百年的“认亲”。这种阅读行为，让融汇在历史中的文化魂魄，得以凝聚于一处，供后来者瞻仰、汲取、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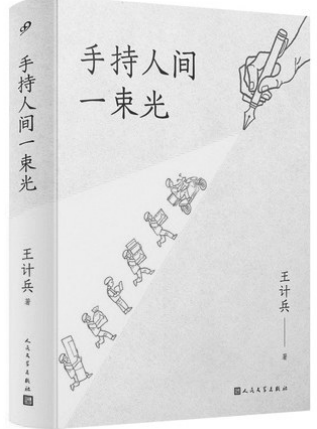
我们读《红楼梦》，不仅是在探查曹雪芹的故宅，还是在大观园的废墟与幻影之上，寄托自己对爱情与繁华的追忆及哀悼。我们读《史记》，不仅是在观看司马迁搭建的宏伟历史舞台，更是在那些成败兴衰的故事里，寻找与自身相契合的智慧，从而为当下的心灵找到历史的坐标。我们在字句中辨认祖先的声音，在叙事里演练生命的可能，在思想中与伟大的灵魂为邻。每一次专注的阅读，都是在为这座纸上的故乡添砖加瓦，让它日益坚固、辽阔，直至足以容纳我们全部的困惑、希冀与梦想。

心灯照亮一己之魂，书楼珍藏千年之智。这或许就是阅读赋予我们的双重馈赠：它让我们在有限的个体生命里，活出无限的文明深度。当合上《生命的灿烂之书：布鲁姆文学之旅》，掩上《且上书楼：藏书楼里的中华文脉》，那张纸间的沙沙声响，既是布鲁姆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的私语，也是范氏族人巡视天一阁书架时的足音。它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人类为了不忘却而进行的壮丽的精神返乡。

■荐书

微光在裂缝中闪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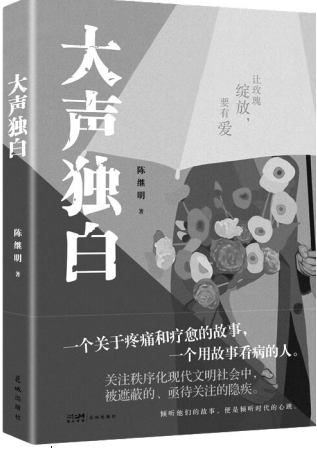
《手持人间一束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外卖骑手、诗人王计兵用他的经历诠释属于劳动者的“诗与远方”。他在送外卖的间隙，把生活中的诗意灵感随时记在烟盒上、废纸片上，写成一首首感人的诗歌。作品既是对日常琐碎的真实记录，也是对人性光辉的深度挖掘，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对梦想的执着以及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思考。他用朴素真诚的情感给这个世界传递温暖。

《大声独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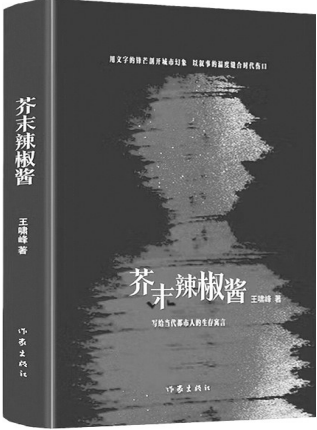
花城出版社



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力作，讲述了一个时间跨度长达30年、关于疼痛与疗愈的故事。主人公李壮从为父亲医治肋肢痛而立志学医，成为洞察精神症结的样本。小说聚焦于当下热门的心理治愈，通过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描绘出社会百态的众生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40年来时代的变迁；同时，通过对这个群体的鲜活记录，留下了一份特殊的时代剪影。

《芥末辣椒酱》

作家出版社



王喙峰以一味辛辣的市井滋味为引，剖开当代都市生活的肌理。困境是生活的回甘，和解是岁月的回甘。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力与独特的叙事风格，以独特视角切入家庭生活，以细腻笔触勾勒人物的悲欢，将市井百态熔铸于文字，在柴米油盐的褶皱里尝尽生活的甘苦。本书集结“城市文学”代表作家王喙峰获奖小说，是写给当代都市人的生存寓言。